

QUANQIUHUASHIYEXIA
ZHONGGUOWENHUAFAZHANYANJIU

全球化视野下 中国文化发展研究

杨生平 /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化视野下 中国文化发展研究

杨生平 /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研究/ 杨生平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56-1361-6

I. ①全… II. ①杨… III. ①文化事业—文化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612 号

QUANQIUHUA SHIYEXIA ZHONGGUO WENHUA FAZHAN YANJIU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研究

杨生平 主编

责任编辑 欧家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16 千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全球化”与“文化”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两个关键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它给人们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如何重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如何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问题、全球化带来的是文明冲突还是融合、世界文化的走向是一体化还是多元化、民族主义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等问题。从文化方面看，随着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的软实力），文化也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力（即文化产业，也称文化生产力）。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有着国际学术前沿性和现实前瞻性，故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动向来看，像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贝克、沃勒斯坦、罗尔斯、费彻斯通等相当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全球化与文化问题。全球化事实上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如正在西方兴起的后哲学文化、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重构、新世界百科全书的重建等就是例证。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并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为政府建构民族精神、文化软实力等提供政策咨询。单从中国来看，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至少有着意识形态建构、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三方面意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何预测世界历史的走向、如何正面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如何营造合理的国际舆论和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如何构建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精神并增强民族文化的整个实力与竞争力、如何利用世界历史规律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如何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立并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等若干问题。因此，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全球化”包括作为一种客观进程的全球化、作为一种认识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全球化等多个方面，对它的认识十分复杂。由于这些层面又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因而研究难度更大。我们可以肯定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客观进程，但由于这种客观进程又是通过人来参与并通过人的意识与文化加以影响，所以不能设想用像数学公式那样的纯客观形式来研究全球化发展过程。人的意识特别是文化严重影响着全球化发展进程，这种影响不完全能用“加速”或“延缓”等词汇表征得那么简单，它还从某种意义上规定着全球化发展方向以及全球化发展的性质等问题。尽管如此，把作为客观进程的全球化作为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前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客观全球化决定着认识全球化与价值全球化。而就客观全球化而言，又有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化与文化全球化等交错的问题。在这些全球化现象中，经济全球化自然是本质性的，它规定并影响着整个全球化的性质以及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发展进程。但如此说又不能否定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们毕竟也影响与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全球化的发展。“一体化”与“多样化”是全球化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世界不同层面有着不同表现。在有些领域它们的关系是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的，但在另一些领域它们的关系又是通过强制推行一种一体化的霸权方式来实现的。对此，约瑟夫·奈对国际政治“三维棋局”思想的分析是有启迪意义的。他说：“国际政治议程已变成一个类似三维的棋局，想赢的话就要既在水平方向又在垂直方向出子。在最上方的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军事事务的棋盘上，美国的确是拥有全球军事触角的惟一超级大国，用传统的术语‘单极’或‘霸权主义’来形容说得过去。但在中间的洲际经济事务的棋盘上，力量的分配是多极的。美国如得不到欧盟、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同意，就无法在贸易、反托拉斯及金融问题上获得自身所期望的结果。称其为美国霸权有点不着边际。在底部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变化、传染病传播等跨国问题的棋盘上，力量在国家与非国家因素广为分布，无序组织。称其为单极世界或者美帝国简直是无稽之谈——尽管左右翼的鼓吹者都这么宣称。这是一系列需要从大的战略来思考的问题。”^①也许我们不完全赞同约瑟夫·奈的观点，但他对世界不同层面问题性质与状况的分析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尽管全球化世界的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性

^① [美]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质与特点，但从总体上讲霸权与平等的博弈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与特征。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国需要有高度文化自觉。文化有自律，有自身独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文化不仅是民族凝聚纽带、人民精神家园，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每个民族都有自身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对每个民族成员来说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人们依靠这套象征体系生存、生活和劳作，维系着不同的人际关系，牵引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不同民族文化而言，很难用“好”与“坏”作简单评价。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碰撞不能用“征服”的方式解决，只能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在文化对话中，“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护自然是正常现象，但这种肯定与维护需要以同时肯定与维护“他者”作为前提，强调并开展“主体间性”的研究与对话。当然，肯定文化自我并不是强调“文化在先”或“文化决定一切”，历史上文化圈、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文化周期等事实也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永恒与完美无缺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要从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中发展自身，只有保持一种开放与谦虚的心态才可能有效地维护民族文化的绵延与发展。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必须要看到文化的他律。尽管文化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地理环境、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等都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文化决定论错误。在处理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关系问题上，意识形态是绕不开的话题。意识形态也属于文化，但它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同于一般文化是以精神关系为核心对各种社会关系反映，意识形态主要是以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为核心对各种社会关系反映。虽然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不能包揽或绝对决定一切社会关系，但它们是一切社会关系基础与核心这一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与宏大叙事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反思。在研究文化问题时不能“过度”应用意识形态理论，但忽视意识形态或主张意识形态终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通过社会制度的形式对社会整体概况的综合反映。文化自觉需要在意识形态自觉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建立在意识形态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发挥文化的作用，增加软实力。当然，意识形态不能代替文化，文化涉及面更广，内涵更丰富，个性色彩更强。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一个相互渗透与聚合的过程。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要巧妙利用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在确保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同时加强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与渗透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文化问题逐步凸显，价值多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在此过程中提炼与建构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十分重要。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发展可起到引领、激励与凝聚的作用。目前，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建构应该考虑到意识形态、全球化、国情与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应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多个层面入手，将自上而下的工作与自下而上的工作结合起来，充分考虑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全球进步因素，做到原则性与包容性的最大结合。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其中有诸多问题需要剖析与疏理。这些问题有的是理论上的，有的是实践上的，有的是思路上的，有的是方法论上的。本书不奢望对这些问题找到完美答案，只期望引起更多关注与探讨。

第一篇 全球化进程文化发展基本理论

- “文明的冲突”与和谐世界 刘新成/3
- 新游戏，新规则：社会科学的危机时刻 阿兰·李比雄/8
- 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不同层次 杨生平/16
- 霸权与平等——文化全球化的双重逻辑 张慧慧/23
- 文化发展与文化“自我” 丰子义/36
- 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辩证思考 郝立新/40
-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
——兼谈经学信仰与21世纪儒家思想的全球化 杨乃乔/44
- “文化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王新举/63

第二篇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实践

-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叶险明/79
- 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传统文化的发展 杨生平/104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杨生平/113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复兴	杨金海/125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谢玉亮/130
积极参与和引领文化全球化	杨金海/141
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和谐诉求	张 敏/145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整合	邹广文/152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叶险明/164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旗帜	颜晓峰/172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若干思考	杨富斌/179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邓海英/191
回到“革命文化传统”的地面	
——谈谈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特征	王一川/199
日本文化现代化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宋振美/207

第三篇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软力量”辨义与当代中国软力量构建	杨生平/21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本质的彰显	吴向东/232
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陶东风/242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孙存良/259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国家观	
——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体会	冯卓然/265
“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	
——兼评种种“五四”精神观	杨生平/278
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与现代大学的使命	周雪梅/289
后 记	/299

第一篇

全球化进程
文化发展基本理论

“文明的冲突”与和谐世界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一、文明分类是西方人的学术建构

时下，对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乃至其他种种“文明”，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甚至以为世界和人类分为不同文明和文明区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明的划分并非自古皆然，各种“文明”之间的区别并非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他们只是近代以来欧洲人在认识世界，特别是在诠释世界历史时创造出来的概念。

在古代世界，受生产力水平和交通条件限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居民难以实现大范围、大规模的交往，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世界”的存在。但是15世纪末叶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开始按照他们的构想描述这个世界的历史。由于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其对世界的征服同步，所以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也充斥着征服者的优越感。他们以世界的“主导者”和“先进文明”自居，将其扩张行为美化为“传播文化”，进而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pattern of dominance and diffusion），即欧洲人将先进文化向其他落后地区逐渐传播的模式。如同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夏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所说，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过程都是福音书的传播和实现过程。

启蒙运动以后，宗教的地位下降，科学兴起，“主导—传播”模式开始寻找科学的依据。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生物学的分类法和进化论，于是，将人类分成不同类型，把欧洲人称为人类社会进化论的代表，就成为“主导—传播”模式新的表达方式。根据这种表达方式，欧洲人首先根据所谓“社会进化论”宣传



“欧罗巴种族优越论”，继而根据爱德华·泰勒的“文化进化论”宣扬由欧洲特有的知识、制度和技术优势所构成“欧洲文化优越论”。进入 20 世纪，在“优等民族”内部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日俄战争以亚洲人胜利告终的结局，冲击了欧洲人种族优秀、文化优越的神话，“主导—传播”模式又转换为汤因比提出的据价值观将“文明分类”最终得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汤因比把世界划分为若干种文明，并将每种文明视为独立存在，就成为西方人看待世界以及世界历史的固定不变的视角。尽管汤因比以其后继者表面上承认各种文明的价值，但是他们的学说最终却以西方人得出了“只有西方文明才代表自由、民主和理性这些最高价值”的理论。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开展，西方学者从欧洲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事实出发，用“反推”的思维方式，苦心孤诣地从西方文明中挖掘“现代化元素”，结果使得各种文明的“对比度”更加鲜明。马克思·韦伯所谓“新教伦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科学思维”、某些经济学家所谓“西欧中世纪市场经济”，不仅从此成为“西方文明”的标签，而且成为辨别其他文明孰优孰劣的标准。

纵观“文明分类说”的发生史，可知这一学说乃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套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出了“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明显的理论偏见之外，还隐含着方法论“陷阱”，即在彰显西方优势，夸大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并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说明其他文明之缺陷的同时，过分强调文明的差异和区别，把每种文明都看成是其他文明毫无关联，甚至毫无共性地孤立存在。尽管目前稍有现代知识的人，包括西方人在内，都已对形形色色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嗤之以鼻，但是对“文明分类说”的方法论陷阱却缺乏认识。西方人仍在大谈特谈“文明的冲突”，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对外来文化也或多或少抱有“非我族类”的看法，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文明之间：互动是发展的动力

西方语境下的“文明分类说”因其缺乏科学性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科学家于 2003 年绘制的人类基因图谱表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具有天然的、不可磨灭的共性。在我们用放大镜寻找人类内部区别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一基本前提。



其次，西方是按照不同文明“特有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分类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这种分类难以自圆其说。其一，在西方人所说的各种文明内部不止包含一种生活方式。以伊斯兰文明为例。16世纪时“伊斯兰文明”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期间经济模式、语言服装、风俗习惯五彩缤纷，教义信条、礼仪形式和戒律戒条也不完全一致，所谓“共同的生活方式”根本无从说起。其二，在西方人划分的各个文明之间，事实上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在不同文明的边缘地带，历史上人们曾经长期互相接触，互通有无。由于和平的交往和战争，商人、士兵、传教士、移民也曾“跨文明”地流动交往，都呈现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各种生活方式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交汇融通。已经不存在绝对“特有的生活方式”或是纯粹原生态的某种“文明”了。

全球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尽管人类分为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存在着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千差万别，但是只要条件允许，不同群体之间总是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接触和交往，而且，这种接触和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和技术变革的动力。人类各个群体都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交往中，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外来经验，一方面在外部压力下加速其内部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前进大多发生于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发生于与外界交往便利的地区，大多发生于与外界交往频繁的时期，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本质，不是差异，而是互动。

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以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为动力的社会发展史。

人类不同群体之间接触、交往和互动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既包括和平友好的互利交流，也包括由于灾难和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流血战争、瘟疫蔓延、人口贩卖和难民迁徙。尽管从长时段、从宏观角度看，所有的接触、交往和互动最终都能够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那些非和平友好的方式在历史上曾经给很多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也是不能回避的。批评西方的“文明分类说”过分夸大不同人群之“差异”，强调互动的作用以突显不同人群之“共性”，目的就是要说明，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的人类各个群体，应该而且只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幸福，应该而且必须避免相互伤害和对抗。



三、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人类社会现存的各种文明有没有走向统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笔者认为，理由有如下几点：

其一，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各个大洲、各个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气候、土壤、水源、矿产资源、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情况都截然不同，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群体只能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对周围环境，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不同特点是必然的、必须的，肯定会，而且也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其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类各个群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很多时候、很多群体都曾面对一个两难困局：即发现别的社会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有着显而易见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向他人学习也许将会促进自身进步，但是也有可能引发自己群体内部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保守自身传统、对其他文化采取抵制甚至对抗的态度，可以增强自己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会付出发展落后的代价。人类各个群体都在不断尝试摆脱这个两难困局。但是既没有谁能够避免外部新事物的诱惑和挑战，能够长期、彻底地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没有谁能够完全抛弃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彻底地与其他民族同化。事实证明：“老死不相往来”是不可能的，“焕然一新”也是不可能的；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求同”、“求进”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本民族文化的个性特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其三，从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来看，多样性的存在以及相互之间的碰撞、刺激和互动，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同样如此。没有各个人类族群、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没有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没有各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和交流，人类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活力。

既然人类社会现存的各种文明永远没有统一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永恒的课题。目前，一方面，空前活跃的人际、国际交往推动着人类社会以及经济、文化取得空前规模和空前幅度的发展，全球性的交换



和互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人们在忠实于自己群体和参与全球化过程之间，还没有找到妥善的协调方式和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当前“全球一体化”与“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两种趋势同时加剧的原因。人类各个群体都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明确自己对外来文化的认识，自觉地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相处的立场和行为。

新游戏，新规则：社会科学的危机时刻

阿兰·李比雄 欧盟跨文化研究所

黄华侨 译 杭州师范大学

一、多极文化世界的跨文化战略或“欧洲/亚洲/非洲”互动知识三角

过去两个世纪，人类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曾经主要依赖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或者换句话说，依赖于西方各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且，与欧洲社会的文化背景，以及与欧洲社会和各种非欧洲文化的交往历史有着深刻联系。列维—斯特劳斯的远处观察原理：“遥远的眼光 (le regard éloigné)”，作为人类学的主要概念，与这种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和多元文化的全球世界，这个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上述关系，因此，也就改变了人类学观察的环境和实践，于是，我们必须彻底重建社会学的方法和原理。

我们必须清楚区分跨文化 (transcultural) 和“文化间” (intercultural) 之不同。跨文化意味着某种“普适”的东西，是一种可能的、共享的新视角或语义平台——这种视角或平台产生于对若干不同文化见解的互动的思考和理解——或者对若干不同文化的意义或表象的思考和理解，如此等等。

这就暗示着，达到一个自上而下、高屋建瓴的观察位置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每种个别文化视角都可以通过其他文化视角得到改进和提高。但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我们需要一种认识论的态度，一种方法论的怀疑，或者说是人类学的怀疑——通过将胡塞尔的“悬置”应用于你自己的文化知识模式和方法论。

跨文化方法论并不废弃或取代个别文化视角，也不涉及一种可能的“混合”视角。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关注前者，把它视为有益的现存视角，同时，对于后者日新月异的发展——因为全球化的缘故，以及对于美国化的标准，保持极为